

论八股文长期沿用的文化机制

罗时进

内容提要 八股文是一种相当僵化的文体,自明代开始,对八股文的批评几乎无时或息,但它为什么能够长期沿用达五百多年之久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种文体用于科举考试体现了统治者巩固体制、维护道统的需要;二是用这种特殊文体试士,对选拔人才有一定作用;三是长期形成的八股文化学术体系,对这种取士制度起到了极大的支撑作用,并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环境。

关键词 八股文 科举考试 文化机制

罗时进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215021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时代主要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这一文体,或称八比文、四书文、经义、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股、八比言其形式,四书、经义言其内容。曰制义,显示其地位尊崇;曰时文,表明其与古文不同。至于制艺、时艺之称,则力图说明这一文体具有文学艺术的性质。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八股文的命运走到了尽头。其实在此之前,这一文体就不断受到指斥和抨击,此后“八股”便成为一个表示形式主义的符号和旧文化的象征。对这一文体,由于历史的评估似乎非常明确,倒反而带来了一些让人不甚明了的疑问。比如,自从这一文体确立,许多人就批评、痛诋甚至视为祸害,那么,它为什么能沿用五百余年,保持着明清时代的第一入世文体的地位呢?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基本问题,本文从统治思想、试士功能和学术建设三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统治思想与科举考试结合一体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学即定于一尊。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兴起,使儒学更直接进入了统治阶级的管理体制。在元代,孔子的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武宗至大元年,制加孔子“大成”之号,即在原有的“至圣文宣王”之上,再冠以“大成”二字。这时朱熹的地位也提高了,远远超出了周、程,几乎接踵夫子。熊禾《考亭书院记》说:“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又说:“微夫子《六经》,则五帝三王之道不传;微文公《四书》,则夫子之道不著。”朱子学的地位于是确立。元代儒学正统思想的推进对明清影响很大。明邓球《皇明泳化类编》卷一〇六记载了明太宗称孔子之言“真治国之良规,万世之师法也”。乾隆《日讲四书解义序》更直称《四书》“道统在斯,治统亦在是矣”。这表明明清两代坚定

地以儒学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宋元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中后期,各种思想、学说时有出现,而社会风尚逐渐衰颓。这就促使统治阶级试图从根本上“正人心”、“振纲纪”,来防范和解决社会危机。显然,以朱子学为明代以来的官学有着深刻的巩固体制的需要。朱子的认识论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即通过“遍格万物”的方法,去明察万物的“所以然”。他从认识的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关系的角度指出:“知在我,理在物”;“格物者,穷事物之理;致知者,知事物之理。”所以,只有“逐一理会”、“格尽物理,则知尽”^[1]。这种“格物致知”的对象,不仅包括社会、自然,也包括儒学理论本身。对于统治者来说,如何才能使人们不断地去“格”圣贤义理,去孜孜无怠地“逐一理会”呢?这就需要有一种文化机制。这种机制既要有理性的吸引,又要有利益的驱动,而这两者的最佳结合,无疑就是科举考试了。用八股文来解经原道,并将这种形式纳入科举考试制度,使征圣、宗经、原道具有持久的动力,以此杜遏异端邪说,控制思想,使一代代踏入仕途的管理者具有修、齐、治、平的修养,从而能够“化民成俗”,以维持和巩固传统的政治体制。这是明清两代统治者的目的,也是他们的智慧。这一举措的效果邵懿辰在《仪礼堂后记》中有一段议论可见:“向使汉不以经术取人,明不以制艺试士,虽圣贤精神与天地相凭依,必不至于泯灭无有,然安能家喻户晓,焯然如今日之盛耶?”即使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所上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也认为以时艺取士“挟经心而明义理,扶人伦而阐心性”,虽未足以育才兴学,然当闭关之世,“犹幸以正世道人心焉”。

将八股文与考试取士结合起来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清高宗在其命学士方苞选辑《钦定四书文》的谕旨中说:

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含英咀华,发摅文采,因此观学力之深浅与器识之淳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诚以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应者甚钜也。

“征应者甚钜”正是由于士子的热衷乃至迷信。为了刺激士子追逐的热情,保证这一文化管理体制的运作,明清两代始终坚持在首场试四书

文,二、三场兼用论、表、诏、判、策的考试全过程中,重点放在头场,极力显示八股文在试士选拔人才中的突出地位。在清代,朝廷虽然也几次下达阅卷官应三场并重之旨,如顺治十六年礼部覆准,“司试各官分别三场,遍阅合订,……若首场工而后场不称,黜不与选。”雍正六年礼部亦覆准:“不得专重首场,忽略后场。”但乾隆二十五年就曾发生“山西乡试掌卷官,将头场文字分给各房外,至二、三场,惟将头场朱卷字号已经呈荐者谏发,其余并不发给”之事。重头场已成通例,其势难以改变。乾隆九年方苞选辑《钦定四书文》成,礼部因议准今后“乡、会试及岁、科试,应遵《钦定四书文》为准。”这是以统治者意志强化士子八股文写作意识的重大措施,也必然更加强化阅卷官的“头场意识”。至嘉庆十年谕:“乡、会试三场并设,经文、策对,原与制艺并重。然必须先阅头场,后阅二、三场,先校荐卷,后搜落卷。”^[2]可见朝廷所重在于头场是一以贯之的。

对头场八股文的重视直接影响到教育过程。正如汤成烈所说,“国学、府学、县学,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乾隆二年孙嘉淦管理国子监事,奏定令国子监诸生于时艺外,各明一经,治一事,使之有用之学。其实此举丝毫无补于事。据陈康祺《郎潜记闻》卷二所称,下至晚清,“国子监六堂课士,仍课时文外无所事事也”。其症结所在,自然是因为头场考试乃入仕关隘。大势所趋,即使是一些有识之士有志于矫正学风,最终也不可能跳出“时文中心”的窠臼。清人曾对这样的教育现状大为感叹:“考所为教,率不出经艺试帖,盖利禄之锢人心久矣。”(陈宝箴《上沈中丞书》)统治者用八股文揭示出一条荣身之途,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因此而生出利禄之心。这种紧密契合,是八股文能行之五百多年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二、体现出一定的选拔人才功能

明开基以后,洪武帝就“访贤才于天下”^[3],而科举被视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途径。明宣宗尝云:“科举求贤,国家重事,于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已。”^[4]宣宗这番话的意思,明代不少帝王都有类似的表达。清代统治者亦以科举为“抡才大典”。为了保证选拔人才的质量,杜塞庸滥,使进入仕途者能当任其事,发挥作用,统治者总力图使科举形

式和过程表现得公正。以八股文取士,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选拔人才的功能。

第一,能较为有效地防范弊窦。唐代科举考试的作弊案已时有出现,至宋为甚,糊名、誊录等措施仍然无力。其时甚至有人以试卷内容作案,如在开头或结尾用特定虚词或古字作标志,串通考官舞弊。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六记载:“淳熙中起汪应辰为大宗伯,有一友屡黜于礼部,甚念之。将就道,约其会于富阳一萧寺中。夜对榻密语云:‘此行或典贡举。《易》义冒子,可用三古字,以此为验。’其友甚感。应辰果知举,搜《易》卷,有冒子用三古字者,置之前列。”此事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当是其时比较典型的科场作弊案。明代为防范此类事件,首先整肃主司其事者。如成化十五年谕礼部臣“科目选贤,国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今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互相纠举,或尔部中详看体访,得出奏来,必重治之。”^[5]清代“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固,得人之盛,远轶前代”^[6]。确实,清代科举贡式条例之密,处罚之重,较之明代都大大突过。其时科场案甚多,一部分可归于政治原因,但惩处舞弊,整肃场屋,有意识将科举问题“曝光”,也是一个重要目的。

但是,仅仅事后处罚以至惩办作弊者,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要杜绝弊窦,还须对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作出规定,以防关节。八股文有一套严格的功令程式,破题、承题、起讲、领题、前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章法极严。题目大小不等,难度不断增加,怪题层出不穷,至有“顾鸿”、“趋虎”、“十尺汤”、“下袭水”等,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也就无法押题。全篇有字数限制,各段落亦有骈散和句数定规,乾隆四十七年,甚至“令考官预拟破、承、开讲虚字,随题纸发给士子遵用”^[7]。经义写作在北宋初创时后幅必入实事,元代也明确规定“以己意结之”,明初相沿不变,但明中叶每以此为“关节”,至万历中大结止^[8]。清康乾时期曾有“复用大结之请”,但终“以为若用大结,未见有益,而弊窦愈起,断不可行,其议遂寝”^[9]。废用大结,一方面是为了禁止议论,钳制思想,一方面也是力求八股程序的严密、规范,包含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和堵塞弊穴的用心。客观地说,八股文一整套刻板的程序实在是走上了极端,长此以往必然使思想僵化,人才摧残。但在中国封

建社会制度日益腐朽,世风颓靡的历史环境中,舞弊不公与僵化死板,两害孰轻孰重是可见的。知其僵化死板却取而用之,从科举取士的角度来说,也是在比较中取其害稍轻而已。顾炎武说:“考试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10],这是客观的。

第二,力求使评卷标准化。考题标准,评卷公正,是考试制度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之一。历代考试形式都各有其不足,清人江国霖云:“汉取士以制策,其弊也泛滥而不适于用;唐以诗赋,其弊也浮华而不归于实;宋以论,其弊也肤浅而不根于理。”(《制义丛话序》)话说得绝对了点,但亦非无根之谈。从技术角度看,宋人便有“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之感。宋《贡举令》规定赋限三百六十字,论限五百字,但一意逞才之士往往突破此限。宋孝宗时,洪迈曾言:“今经义、论、策一道有至三千言,赋一篇几六百言,寸晷之下,惟务贪多,累牍连篇,何由精妙?宜俾得各遵体格,以返浑淳。”各遵体格的要求,一方面是为了改变文风,同时也可以士子日盛,而卷轴如山的现实情况面前,使评阅试卷量减少而更能标准地、客观地评判,较为有效地改变阅卷者困于批阅,迫于日限,去取不能得当的窘迫状况。

明清两代,举子更多,每年试卷山积,朝廷屡屡增加考试官和阅卷官仍难以应付。这也客观上要求考试形式以程序化体现标准性。就四书文的字数来说,明初限三百字以上,明中叶约五百字,明末约五百五十字。清顺治二年规定每篇不得超过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议五百五十字恐词意不尽,若不限字数又相沿冗长,嗣后限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始定乡试、会试两试及学臣取士每篇俱以七百字为率,违者不录。”^[11]这一定式,至清末未易。严肃起见,清代定例各省乡试揭晓后,须依程限将试卷送至礼部磨勘,延迟者问罪。起初由礼部派钦差大臣磨勘,然解额渐广,试卷日多,于是令九卿共同磨勘。磨勘之例自乾隆二十四年变严,世或以“魔王”称之^[12]。试卷如潮,先要批阅,复又磨勘,若非有程序化的严格规定,其繁复难以想象。

阅卷及磨勘都要有一个评价尺度,不仅在形式上可以衡量,在语言上也应可以把握。写作八股文限用《朱子章句集注》正适应了这一要求。在明清统治者和儒学学者看来,朱子集注切合原意,流

畅易懂,是当时典型的、标准的书面语。因此,限用《朱子章句集注》,学子以程文为“矩矱”临场作文,可以防止滥造生僻词语,而考官和磨勘官也能以一种语言标准来衡校举子的“执经之心,执圣之权”,评决举子是否“沉潜乎理训,周悉乎世故,曲折乎文章”。作文与衡文的语言有确定的依据,这不仅有利于防止语言上做关节的现象,也有利于用统一的标准公平地选拔人才。

第三,能测试出举子的写作能力和学养。八股文是一种兼采骈散,并包多艺,具有独特体制的文学体裁,清焦循称其“御宽平而有奥思,处恒庸而生危论,于诸子为近。然诸子之说根于己,时文之意根于题,实于六艺九流诗赋之外别居一格”(《时文序》)。焦氏是深于经史之学的学者,又是极富性情的诗文作家,其“别居一格”是可信的。只是这种“别居一格”是否如他所认为的已可与唐诗、宋词、元曲同样可称“一代之胜”(《易余籀录》),则大可斟酌。但可以相信,正因为“时文之意根于题”,作为一种命题性的论体文,用之于科举考试,尚能够测试举子的写作能力和治学修养。焦循之后,江国霖对制义文体和写作特点的论述引人注目。其云:

制义者,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要其取于心,注于手,出奇翻新境最无穷。心之所造有浅深,故言之所指有远近;心之所蓄有多寡,故言之所含有广狭,皆各如其所读之书、之分而止。(《制义丛话序》)

江氏之论说明,这一文体本身对于作者来说是有表现多种文学艺术素养的天地,能够反映出作者的构思和写作的能力以及先天之分、后天之学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将其用之于科举考试,作为衡量举子的“标尺”,有一定的合理成分。这把“标尺”虽然往往只能作技术性的检验,但有时风格、个性也可能由此得到肯定。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溧阳任香谷尚书典试江西,时题为“仕学优”二句。将写草榜,尚书曰:“诸卷文字固佳,但皆仕学套语,西江大省詎无遗派乎?”众谢以力搜,无有。一房官进曰:“敝房一卷,几不可句读,却无仕学套语。”亟取阅之,即拍案击赏,定为榜首。曰:“此真西江派。”揭晓则周力堂学健也。^[13]

如果说周学健的录取多少带有偶然因素,那么,许多鸿儒硕士由试八股而取士则较能说明问题。何焯曾举明代于谦、王守仁为例,言其“功业赫赫昭人,虽三代大臣何以远过,而其进身皆不出八比”^[14],为八股文取士正名。汪廷珍于嘉庆初年先后任安徽和江西学政,他在所订的《学约五则》中也极力为时文辩护,肯定“夫时文者,古文之一体,犹之碑志、传记、表疏、论序云耳”,并列举清代前期著名人物云:“邃经学者莫如李文贞(光地),善为古文者莫如方侍郎(苞),工诗律者莫如王文简(士禎),三公之于制艺,未尝苟也。传汉学者莫如惠学士(士奇),讲宋学者莫如陆清献(陇其),蔡文勤(世远),三公之于制艺,未尝苟也。今之厌薄时文者,其经学、古文词果能出诸公之上乎?”至于著名文人洪升、沈德潜、袁枚、姚鼐、冯桂芬、李慈铭、吴汝纶、沈曾植无不是进士出身。尚可注意的是,有清一代一批社会下层士子以八股取士,跳过“龙门”,其中秦大士、姚文田、洪钧、张謇、刘春霖等都属寒门出身^[15]。八股文确是中国文学史各文类中文法最为繁琐的一种,然而正因为如此,它具有了某种“精确度”,这种“精确度”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能够实现评文、衡人、选才的功能,这使得八股文长期使用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三、建立了八股文化学术体系

八股文之所以能行之长远,除了具有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文化属性和一定的社会基础外,还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学术体系作为支撑。这个学术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四书五经内容的研究,一是对八股文写作方法的研究。前者涉及八股文的内容,后者则关乎八股文内容的表现。

自南宋后期起,尊崇四书,代有阐释训解,但在学术上并未统一。明以制义取士,势必要求推进和统一经义学术。永乐十二年,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奉敕修《五经四书大全》,次年九月告成,明成祖亲自制序,弁之卷首,命礼部刊赐天下。清四库馆臣评曰:“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永乐十三年,胡广等又受命编纂《四书大全》。此书凡三十六卷,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度阁,所研究和辨订者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滥觞于此书。在胡广等奉敕撰《五经四书大全》的同时,还奉敕撰成《性理大全》,凡七十卷,

广采宋元以来性理学说于一帙,成祖亦御制序文颁布。以上三书为永乐所订之“三大全”。这些理学巨制,借帝王尊崇,应科举之需而成,弊端诚为四库馆臣所言,其书“见有明儒者之经学,其初不敢放轶者,由于此;其后不免固陋者,亦由于此。”但是,应当承认这些著作,继承理学文化遗产,荟萃众说,明代士子为应科目而无不诵习,在客观上也有推进学术的作用,故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中称“三大全”尤为造成一代学术思想之根柢”(第二十五章)。当然,学术要发展,则不能定于一尊。事实上,朱子哲学体系其后不久就受到了挑战。王阳明的“心学”对传统儒学注入了新的内容,王良的“立本”学说,李贽对道统的批判,都别开生面。即使是对《四书》、《五经》的文本阐释,明代中后期仍然多有面世,如高拱的《问辨录》、陈士元的《论语类考》、《孟子杂记》、赵南星的《学庸正说》、刘宗周的《论语学案》、章世纯的《四书留书》都有较大影响。其中有些作者本身就是以制义而成名家者,故阐释经义,能别具深心,标举精义。

明末清初,宋儒理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入清后学者们倡实学,兴考据,学风一变,流派纷呈。但是儒学一统的局面始终未易,朱子理学仍然占有官学地位。正因为如此,不仅黄宗羲、王夫之这些清初大儒多有著述^[16],其后朝野上下,学校书院,众多学者都纷纷治经立说。清前期陆陇其的《四书讲义困勉录》、《松阳讲义》,喇沙里等的《日讲四书讲义》,孙逢其的《四书近指》,胡渭的《大学翼真》,李光地的《榕村四书说》,阎若璩的《四书释地》,焦袁熹的《此木轩四书说》,江永的《乡党图考》以及毛奇龄一系列指瑕摘疵的论述,皆不拘旧说,或论或考,辨析歧疑,自抒所见,成一时名著。这些著作对研究儒学,推进学术之功实不可泯,对于“欲其即圣贤之言,引而归之身心,不徒视为干禄之具”(《松阳讲义原序》)的芸芸举子来说,无疑具有学术和应用两方面的价值。江永《乡党图考》刊行不久,有士子偶然先获之一读,恰在应考中遇到出《论语·乡党》义题,即采用了书中的许多论点,而考官尚未读江永之著,便对这份考卷大加赞赏。当时这些著述在科举中的影响也由此可见一斑。

八股文化学术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写作方法的研究。宋元两代已有一系列研究时文写作方法的著作,而且其探讨已经深入到时文结

构的各个局部。明清两代制义程式越来越琐细,要求越来越苛切,成为历代文体中最难的一种。正如杭世骏《制义宗经叙》所说:“制义特文之一端,而吾以在诸体中,立言最难,而深造政不易。执经之心,执圣之权,非沉潜于理训,周悉乎世故,曲折乎文章之利病,童而习之,有白首不能涉其津岸者矣;才辨锋起,切而按之,有毕世不能通其条贯者矣。何也?能文之士多,而见道之士少也。”对于制义的语言表达,向以“清通中式”为法则。然而,“本色文字,句句有实理实事,这样文字不容易,必须多读书,又用过水磨功夫方能到,非空疏浅易之谓也。”(李光地《榕村语录》)但是在迷信科举、迷信八股的氛围中,真正为了使思想“见道”,文字“清通”肯下“水磨功夫”的士子只有一小部分,更多的士子无非以此为敲门砖、弋猎之具,欲走快捷方式,多存侥幸。因此,各类写作方法的“新科利器”便应运而生了。这类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范文,一类是写作技巧。

八股文的范文主要以选本、稿本的形式出现。据顾炎武《日知录·十八房》所述,明代坊间选本有程墨、房稿、行卷、社稿四种。程墨为乡、会试主考、房考拟作,或从已中式举子中选出的佳作;房稿为十八房进士之作;行卷为举人本房之作;社稿为诸生会课之作,亦有名士集社的雅制,如夏允彝、陈子龙等的《几社社会七集》之刻,以及《雅似堂》、《东华集》等。稿本似初始于明永乐间于谦,成化间王鏊制义尔雅卓然,其《守溪文稿》最为风行。嘉靖间,唐顺之、归有光号为时文大家,文稿也甚得时誉。随着明后期学术重心下移,“文章之权始在下”^[17]的倾向出现后,民间操持选政者更大量推行各色社稿,大有与程墨争锋之势。

至清代坊刻冒滥,完全成为乘时射利之具。从顺治、康熙朝始,皆曾悬以禁令,但未见奏效。乾隆初命方苞选定一编,作为钦定范式。方氏以时文发展变化为依据,以化治、正嘉、隆万、启祯、清初各裁一编,用传统的评点方法,每篇皆加圈点,细批旁注,并抉其精要,于篇末概括总评。此书系继俞长城《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后的一部规模更宏的制义精选本,因谕旨天下奉行,影响更大。其后私刻选本、稿本汗牛充栋,质量参差,但大都沿用《钦定四书文》体例编纂,不仅以佳作示范,而且加以圈点评析,对于指导时文写作来说,不乏精彩的见识。

另一类专门研究时文具体写作方法的著作,对八股文化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类书籍甚多,虽然有不少陋滥之作,但其中亦有确具写作经验和理论品位者。有不少论著都间有焯见。如路德《时艺核》论时文之“伪”云:“‘伪’者,或貌合神离,或语多意少,或外强中干,或有理无法,或有笔无墨,或有色无香,或有音无韵,凡若此者,皆伪也,非剽窃所得即倚傍而成也。”应该说,这类评论已涉及到作品的审美层次。综合路氏的《时艺课》、《时艺辨》、《时艺话》、《时艺综》各编,其论题论法,句析字解,从今天写作理论视角来看,也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这类书往往求面面俱到,以迎合士子之需。举苏春帆《四书大小题辑解》为例,其总论即有:读书说、训蒙说、讲义作文、读法、作法、相题、布局、立意、用笔、措词、出落、对仗。题型分析则有:论理性题、论学问题、论政事题、论虚窘题、论枯寂题、论论述题、论比喻题、论排句题、论长题、论搭题、论割截题、论连章题。时而大帽子下只有片言只语,虽偶见精妙,但整体铺衍,平庸肤廓。尽管如此,自明代中后期至清末几百年间,这类著作却有着极大的市场。而这种市场,正成为一代代士子的应试支撑。它不仅提供了一种操作工具,一种琢磨好了的敲门砖,而且形成了一种文化环境。如果我们把经文训解、释义、考据方面的论述看成是八股文化中具有较高层次的学术成果的话,这些“新科利器”却复杂得多,且大多数属于低层次的,甚至有的纯属“文化垃圾”。但正是这些不同层次、良莠相掺的著述,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庞杂的、具有很

强的应用性和强大吸引力的八股文化体系。当我们追溯八股文两朝传承,五百余年沿用而未能改易的原因时,对这一文化体系实在不可忽视。

注释

- [1]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五 朝鲜古写徽州本。
[2]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2-86页。
[3]劳堪《宪章类编》卷十八《征贤》,万历六年刻本。
[4][5]劳堪《宪章类编》卷二十二《各省乡试》,万历六年刻本。
[6][7]《清史稿》卷一〇八《选举志》,清史馆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8]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9][11][13][14]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10]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搜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12]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9页。
[15]宋元强《清代的科目与竞争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该文有较详细的资料,可参看。
[16]船山仅有关《四书》的著述即有《四书训义》、《四书授义》、《四书笺解》、《读四书大全说》、《四书稗疏》、《四书考异》等多种。
[17]徐世溥《同人合编序》,《明文海》卷三一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229页。

〔责任编辑:平 啸〕

On the Cultural Mechanism of the Long-term Existence of Eight-part Essay

Luo Shijin

Abstract: Eight-part essay is a kind of stereotyped writing style, the criticism of which has hardly ceased since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it has been used for as long as five hundred years, for which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irstly, it is employed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so as to satisfy the demand of ruling class for consolidating system and maintaining doctrines; secondly, used to test scholars, it makes contributions to the selection of talented people; lastly, the long-existing stereotyped cultural and academic system supports to a large degre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which eight-part essay is employed, and forms a steady cultural environment as well.

Key words: eight-part essay;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ultural mechanism